

《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丛书

国外经济学讲座

第四册

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丛书

国外经济学讲座

第四册

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外经济学讲座

(第四册)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开本 $12\frac{1}{4}$ 印张271千字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0册

统一书号: 4190·095 定价: 1.00元

(限国内发行)

国外经济学讲座

(第四册)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开本 $12\frac{1}{4}$ 印张271千字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0册

统一书号: 4190·095 定价: 1.00元

(限国内发行)

目 录

第四十六讲	福利经济学基本理论·····	(1)
第四十七讲	以福利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 经济学和“福利国家”论·····	(44)
第四十八讲	二十世纪前半期的工业区位理论·····	(71)
第四十九讲	当前工业区位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98)
第五十讲	农业生产经济学基本原理·····	(122)
第五十一讲	新古典综合——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	(143)
第五十二讲	新剑桥经济学·····	(161)
第五十三讲	希克斯对凯恩斯经济学说的解释和 评论·····	(177)
第五十四讲	战后瑞典学派经济理论·····	(200)
第五十五讲	货币主义·····	(234)
第五十六讲	西德新自由主义与“社会市场经济”·····	(253)
第五十七讲	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学说·····	(273)
第五十八讲	新制度经济学·····	(309)
第五十九讲	激进经济学·····	(340)
第六十讲	苏联经济思想的演变·····	(354)

第四十六讲

福利经济学基本理论

一、福利经济学的产生及其演变

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产生于本世纪初期的英国。它的出现，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国阶级矛盾和社会经济矛盾尖锐化的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英国经济遭到沉重的打击。从国内来说，英国经济开始出现长期停滞趋势；从国际来说，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已经发生严重动摇。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英国工人阶级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使英国工人运动出现新的高涨。自治领和殖民地加强了对英国殖民统治当局的斗争，开始了英帝国的解体过程。这些情况必然会反映到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来，福利经济学的出现就是这种反映的一个重要方面。现代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汉内（L. H. Haney）承认：“英国社会问题——庞大财富和群众贫困的对比——非常严重，并且由于世界大战而变得尖锐起来。因此，有些思想家以建立‘社会福利’这一标准概念作为目标，并引导经济学研究社会政策以接近这一目标的趋向便加强起来。这种研究趋向就叫作‘福利经济学’。”

现代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起源于霍布森（J. A. Hobson）

和庇古 (A. C. Pigou)。从霍布森、庇古提出福利经济理论以后，福利经济学便成为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卡特林 (W. B. Catlin) 在《经济学的进展》一书中说：“自从霍布森和庇古以来，‘福利经济学’一语便广为使用。”

霍布森是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改良主义者，他在许多论文和著作中都论述了“福利”问题。霍布森说，以往“所有经济学家”都未能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和“压迫”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他主张，应当以“社会福利”作为经济研究的中心问题，这是经济学的“新方向”。霍布森承认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剩余价值”，承认“剩余价值”的占有是不劳而获。但是，他曲解剩余价值的性质和源泉，硬说剩余价值是在“竞争性的议价”中产生的，议价双方有一方是强者，另一方是弱者，由于议价力量的不平等，议价结果使强者占有了“剩余价值”。他认为，这种分配是不平等的，已经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霍布森表示他特别关心“剩余价值”的处理和分配问题。他主张，应当通过税收政策，或者通过国有化，使“剩余价值”归政府所有，用于“社会福利”。

庇古是英国现代著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剑桥学派领袖人物马歇尔的继承人。他于1920年出版了《福利经济学》一书，建立了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边沁 (J. Bentham) 的功利主义。边沁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功利主义理论家。边沁的功利主义的出发点是，人都有追求幸福和避免不幸的天性，也就是趋利避害的本性。边沁宣称，对任何人来说，人生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获得最大

幸福。“品行最坏的人和有德行的人都有完全一样的行为动机；无论这种人或那种人，都想增加自己的幸福总量。”他主张，对一切人类行为的伦理判断都应以此为准。凡是能带来快乐或增进幸福的行为便都是善，相反的就是恶。社会是组成社会的所有个人的总和，为了求得社会的最大幸福，应当使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这样，“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便成了边沁功利主义的最高目标。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政府实行自由放任政策，让每一个人都自由地追求个人的幸福，增加自己的幸福总量。边沁认为，幸福总量是可以计算的，伦理就是对幸福的计算。这就是边沁的“效用原则”或“功利原则”。边沁的功利主义在十九世纪上半期就被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用来为资产者自由地追逐利润进行辩护。到了十九世纪末，有的庸俗经济学家公开提出要把研究幸福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把边沁的功利主义作为判断幸福的准则。

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一书中虽然表面上并不主张以边沁的功利主义作为哲学基础，然而实质上是据此立论的。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认为，每个人都追求最大福利，个人福利是个人满足的总和，而社会福利则是个人福利的总和。很明显，这些论点正是边沁功利主义的翻版。连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家李特尔(I. M. D. Little)都说：“庇古教授自己好象并不承认伦理的功利主义，但却接受了边沁的全部学说，即社会福利是各个人的福利的总和，一个人的福利是他所感到的满足的总和。”李特尔认为，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就是“功利主义经济学”。

从边沁的功利主义出发，庇古认为“福利”是人们对享受或满足的心理反应或主观评价。他把“福利”区分为“社

会福利”和“经济福利”。前者含义很广，“自由”、“家庭幸福”、“精神愉快”、“友谊”等都可以包括在内；后者含义较窄，社会福利中只有“能够用货币衡量的”部分才可以称作经济福利。庇古认为，只有经济福利才是福利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根据“效用可衡量性”和“个人间效用可比较性”的原则，庇古提出了国民收入极大化和收入均等化两个福利命题。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虽然是以“完全竞争”为出发点的，但是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着“个人经济”和“社会经济”的矛盾，因而主张国家采取某些干预政策，以增大“经济福利”。

《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发表，标志着现代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的产生。庇古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界赢得了一些追随者，他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此后，庇古继续“研究”福利经济学，除了几次修订和再版《福利经济学》以外，三十年代后期又出版了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有关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比较》，直到五十年代前期他还发表了有关福利经济学和“福利国家”论方面的文章。

三十年代，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受到罗宾斯(L.C.Robbins)等人的批判。

罗宾斯认为，理论经济学或实证经济学应当将“价值判断”或“伦理判断”排除在外，而庇古却把这种伦理判断或价值判断引进了经济学。罗宾斯说，“效用可衡量性”和“个人间效用可比较性”是不能成立的。他认为，庇古把“个人间效用可比较性”作为研究经济科学的根据，就是在经济研究中使用伦理判断代替了事实判断，这就使经济学从实证科学变成

了伦理研究。罗宾斯着重攻击了庇古根据“个人间效用可比较性”提出的收入均等化的命题。

继罗宾斯之后，卡尔多(N.Kaldor)、希克斯(J.R.Hicks)、勒纳(A.P.Lerner)等人从洛桑学派帕累托(V.Pareto)的理论出发，也对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进行了批判。

尽管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受到了批判，但是，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感到福利经济理论对于垄断资本来说仍然是一种有用的工具。例如，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哈罗德(R.F.Harrod)说：“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仍然具有生命力”。

从三十年代末开始，福利经济理论的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1939年，卡尔多发表了《经济学的福利命题和个人间的效用比较》一文，提出了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的问题。此后，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希克斯、西托夫斯基(T.Scitovsky)等人围绕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问题做了不少文章，形成了福利经济学的一个新的流派。他们主张把价值判断或伦理判断从福利经济学中排除出去，代之以实证研究；主张把福利经济学建立在“选择理论”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效用可衡量性”和“个人间效用可比较性”的基础之上；主张把最优条件作为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反对研究收入分配问题。

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福利经济理论，后来又受到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伯格森(A.Bergson)、萨缪尔森(P.A.Samuelson)等人的批判。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虽然也同意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将“效用可衡量性”和“个人间效用可比较性”从福利经济学中排除出去，但是他们认为福利经济学不应当回避价值判断或伦理判断。在他们看来，卡尔多、希克斯等人反对收入均等化而主张保持分配现状的判断本身

就是一种价值判断或伦理判断。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还认为，福利经济学固然要研究最优条件问题，但是不能以此来回避收入分配问题。他们认为，收入分配问题应当根据一定的价值判断或伦理判断来决定。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提出的福利经济理论叫作“社会福利函数理论”，他们形成了福利经济学的又一个新的流派。

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中，为了区分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和庇古以后的福利经济学，一般称前者为“旧福利经济学”，称后者为“新福利经济学”，或称前者为“古典福利经济学”，称后者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对于庇古以后的福利经济学，为了区分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福利经济理论和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的福利经济理论，一般称前者为新福利经济学的“补偿原则论派”，称后者为新福利经济学的“社会福利函数论派”，但也有时称前者为“新福利经济学”，称后者为“新新福利经济学”。

由于新福利经济学的补偿原则论派和社会福利函数论派都是从帕累托的理论出发的，所以一般认为新福利经济学可以溯源于帕累托，有人甚至认为帕累托是新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新福利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除了已经提到的卡尔多、希克斯、伯格森、萨缪尔森以外，还有霍维林（H. Hotelling）、勒纳、西托夫斯基、阿罗（K. J. Arrow）、格拉夫（J. de V. Graaff）、李特尔等人。

五十年代以来，在新福利经济学中最受重视的是阿罗的福利经济理论。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阿罗对福利经济学的“突出贡献”，是他在《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一书中提出了“不可能定理”。按照阿罗的这一“定理”，从个人偏好次序引导出社会偏好次序是不可能的。现在，一些资产阶

级经济学家正在阿罗开辟的社会选择理论领域中继续进行研究。

半个多世纪中，福利经济学在不断演变。现在，一些论著或者侧重研究抽象的福利经济理论，或者侧重研究福利经济理论在具体经济问题或经济政策方面的应用，因而有理论福利经济学和应用福利经济学之分；一些论著或者着重研究微观经济领域的福利经济理论，或者着重研究宏观经济领域的福利经济理论，因而有微观福利经济学和宏观福利经济学之分；一些论著或者偏重研究静态经济福利，或者偏重研究动态经济福利，因而有静态福利经济学和动态福利经济学之分。

二、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福利经济学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福利经济理论体系不仅因新、旧福利经济学而异，而且因派、因人而有不同。这里，我们只讲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

（一）福利经济学是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予以社会评价的经济学

什么是福利经济学？尽管在福利经济学史上有过种种不同的定义，甚至直到现在在西方经济学界仍然有不同的说法，但是，目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福利经济学是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予以社会评价的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或实证经济学有什么区别？关于这个问题，过去和现在也都有不同说法。目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理论经济学或实证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体系的运行，它说明经济体系是怎样运行的以及为什么这样运行。例

如，它说明价格是如何决定的，并且说明为什么这样决定。据称，这种说明是用事实来检验的。简单说来，理论经济学或实证经济学只回答“是”和“不是”的问题，它不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作出社会评价。也就是说，它不回答“好”和“坏”的问题。例如，一个经济体系是否发生了通货膨胀，它可以回答“是”或“不是”。而对于通货膨胀的类型，它可以回答是“温和的通货膨胀”或“奔腾的通货膨胀”。对于通货膨胀的原因，它可以回答是“需求拉力通货膨胀”或“成本推力通货膨胀”。但是，涉及通货膨胀是“好”是“坏”的问题，它则不作回答。也就是说，它不对通货膨胀进行社会评价。又例如分配问题，理论经济学或实证经济学只说明分配是如何决定的，并说明为什么这样决定，但不回答这种分配是“好”是“坏”。与此不同，福利经济学既然是一门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予以社会评价的经济学，它就必须回答经济体系的运行、经济活动的进行、经济政策的实行是“好”是“坏”的问题，必须根据一定的价值判断或伦理判断，确定经济体系的运行、经济活动的进行、经济政策的实行是否符合既定的社会目标。

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有人把理论经济学或实证经济学比作天文学，把福利经济学比作占星学，把理论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关系，比作天文学和占星学的关系，并认为这种类比“在许多方面都是一种很精确的类比”。其理由是，天文学只研究天体的结构、性质和运行的规律，不涉及社会评价问题，也就是不涉及是“好”是“坏”的问题，而占星学则要根据星象来推断所问事物的吉凶，根据对星辰运行的观察预言人事的祸福。

上述说法，一方面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理论经济学说成是

可以超脱阶级利害关系而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如何运行以及为何这样运行的科学，否认它的阶级性以及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事实，另一方面企图把资产阶级的福利经济学说成是可以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运行作出没有阶级偏见的公正社会评价的科学。不过，上述比喻无意中泄露了福利经济学的秘密使命，这就是要使资产阶级感到不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占卜吉凶和预言祸福。

（二）价值判断和社会目标

福利经济学家在福利经济学应不应当排除价值判断这个问题上虽然存在过尖锐分歧，但是现在他们当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福利经济学必须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作为出发点，或者说，福利经济学应当根据已经确定的社会目标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理由是，没有价值判断或社会目标，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予以社会评价就没有可依据的标准。他们当中有人指出，即使那些口头上主张把价值判断从福利经济学中排除出去的人，实际上仍然是从价值判断出发的，只不过根据的是另一种价值判断。

所谓价值判断，是指具有影响、推荐或劝说力量的判断，判断各种可供选择的行动是不是符合个人愿望和社会愿望。在经济学中，价值判断是用能影响人们对经济事实所抱的态度从而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的方式来叙述经济事实的。例如，“张三的生活比李四好”，“一块钱给李四带来的满足比给张三带来的满足更大”，这类判断便都是价值判断。

按照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说法，理论经济学或实证经济学提出的有关现实世界的命题，是事实判断。这类命题或判断要用事实加以检验。与此不同，福利经济学提出的命题是根据定义和假设得出的逻辑推论，一般说来属于伦理判

断。至于福利经济学所根据的定义和假设本身，可能是现实的，也可能是不现实的；可能是带有伦理性的，也可能是不带有伦理性的。检验理论经济学或实证经济学的正常途径是检验它的结论，而检验福利经济学的正常途径是检验它的假设。在实证经济学中可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求证中检验假设。与此不同，在福利经济学中对于假设要持慎重态度，要仔细审查假设本身。

现代福利经济学家认为，社会目标具有伦理的性质，因此，社会目标也就是伦理目标。社会有许许多多的个人，对伦理目标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很难取得一致意见。社会目标或伦理目标不是由经济理论分析决定的，不是由经验事实决定的，而是假设的。因此，福利经济学在确定社会目标时只能求助于审慎的假设。但是，在假设时必须充分考虑到所假定的社会伦理目标应当是为“大多数人”所能接受的伦理目标。有了假定的社会目标，就可以对经济体系的运行进行社会评价。社会目标不同，社会评价也就不同。

在目前的一些福利经济学著作中，提出了三大社会目标：1. “最大的选择自由”；2. “最高的效率”或“最大的满足”；3. “最公平的收入分配”。

第一个社会目标是“最大的选择自由”。福利经济学所说的选择自由，是指经济领域中的选择自由。属于这种选择自由的，主要是：个人有权自由选择职业，有权自由买卖商品和劳务。据说，要达到最大的选择自由这一社会目标，社会就应当保证每个消费者都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爱好的商品和劳务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就应当保证每个生产要素所有者自由决定他是否和如何提供给厂商使用，就应当保证每个人自由地选择自己所爱好的工作，包括自己所喜爱的工作单位和工作

地点，就应当保证每个人自由地安排工作时间和支配业余时间，就应当保证每个厂商自由地创立和经营企业并自行决策。福利经济学认为，选择自由是一件好事，是达到最优生活标准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福利经济学又强调，在选择自由时应当区分相对选择自由和绝对选择自由。他们认为，选择自由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选择自由只能在维护整个“社会利益”的范围内进行，这种自由不能妨碍别人的权利。据说，只有在维护“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对选择自由加上若干限制，才能保证每个人都得到最大的选择自由。

第二个社会目标说的是最优资源配置和最大产量的问题。第三个社会目标说的是收入分配问题。关于这两个问题，留待后面再讲。

由上可见，福利经济学家公开或是暗中把价值判断引进福利经济学，他们都重视社会目标的提法，力图使之具有蛊惑性和欺骗性，而又不致给垄断统治带来任何危险。所谓在确定社会目标时要求助于“审慎的假设”，实际就是这个意思。“最大的选择自由”、“最高的效率”或“最大的满足”、“最公平的收入分配”这三个社会目标的提出，正是他们“审慎的假设”的结果。

（三）价值理论和福利命题

福利经济学有一个共同的价值理论基础，这就是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关于边际效用理论的基本内容，第三讲已经讲得很清楚。这里要说的是，边际效用理论分为边际效用基数论和边际效用序数论。旧福利经济学以边际效用基数论作为自己的价值理论基础，新福利经济学则以边际效用序数论作为自己的价值理论基础。

边际效用论所说的效用是主观效用，指的是商品在消费过程中给消费者带来的一种主观心理上的满足。边际效用是指增加一个单位商品在消费过程中给消费者主观心理上增加的满足。随着商品数量的增加，每一增加的商品所包含的边际效用递减，这就是所谓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根据第三讲所给出的数字，可以画出一条从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的边际效用曲线（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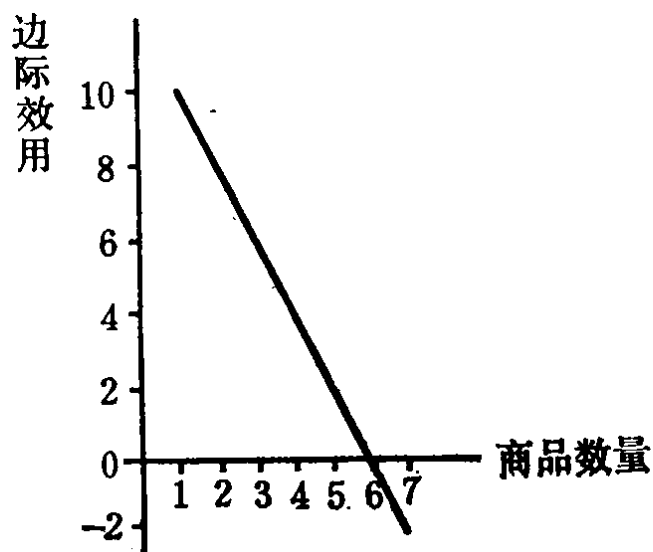


图 1

图1表示，第1个单位商品给消费者带来的边际效用是10个单位，总效用也是10个单位；第2个单位商品带来的边际效用是8个单位，两个单位商品的总效用是18（=10+8）；……；第6个单位商品的边际效用是0，而6个单位商品的总效用是30（10+8+6+4+2+0）；第7个单位商品的

边际效用是-2，而7个单位商品的总效用是28（=10+8+6+4+2+0-2）。

效用基数论认为，效用是可以衡量的，可以用数词中的基数数词1，2，3，……来表示效用数量的多少。就象体温计可以衡量出人的体温的绝对数值一样，商品给人们带来的效用或满足程度也可以用一种效用衡量单位表示。效用衡量单位不仅可以衡量相同种类商品的效用，而且还可以衡量不同种类商品的效用。比方说，用这种效用衡量单位，可以